

古代民间谣谚勾勒出贪腐众生相

民间谣谚作为百姓对生活的洞悉与总结，以极具特色的鲜明的民间语言，反映了百姓的真实心声、概括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传递出对善的追求与对恶的贬斥。其中，以对贪腐的嘲讽和表达反贪诉求的谣谚最具特色。

勾勒贪腐众生相

封建社会中，人治色彩较为浓厚，贤君良相统治时期，会出现相对较为清明的社会氛围；暴君奸臣统治时期，则又呈现出腐化堕落的景观。从古代谣谚角度归纳一下腐败类型，描述一下腐败众生相，显得尤为必要。首先来看权钱交易者。政治秩序越无序，腐败滋生得越快。金钱可以换来权力，权力可以换来金钱，这种权钱交易刻画出卖官者的狂妄和买官者的痴癫。东汉末年，朝廷腐败的特征就是权钱交易。当时崔烈用五百万跟汉灵帝买相当于宰相的职位，权钱交易实现后，汉灵帝非常遗憾地说自己手太软了，没有卖千万的价钱。这种权钱交易的行为扭曲了官员价值观，破坏了政治生态，使得社会朝着更加无序的方向发展。东汉末年就出现了这样的谣谚，“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权钱交易后形成的不良

政治格局。

其次来看利用权力追求奢靡。贪官敛财的目标是为了享受和挥霍。明代部分地方官将贪腐所得，除存留一部分孝敬上司外，其余的都用来挥霍享乐。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谣谚：“知县是扫帚，太守是漏斗，布政是叉袋口，都将去京里抖。”另外，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类型也层出不穷，谣谚中都有反映。这些贪污敛财的众生相不仅使得贪腐者丑态毕露，而且这种贪腐行为还对吏治、社会和国家危害极大。

揭示贪腐大危害

腐败是一颗毒瘤，如果一个国家长了这颗毒瘤，不去及时根治，就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个灾难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

从政治角度讲，腐败会导致公共权力滥用和腐化。北宋末年的大贪官、“六贼”之一朱勔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敛财，为个人纵欲享乐提供条件，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奴许愿封官赐爵，其中受金腰带者达数十人。民间谣谚说：“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朱勔的腐化堕落侵蚀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危害了政权的巩固和维持，是北宋走向灭亡的重要

原因。

从经济角度讲，腐败会导致直接的经济损失。清代大贪官和坤，是清代以“贪鄙成性”而被诛杀的最高级别官员。嘉庆亲政之日大诛和坤，得到百姓的广泛民意支持。当时百姓有“和坤跌倒，嘉庆吃饱”这样的谣谚之说。按照梁启超的估价，和坤共贪污敛财达八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十多年财政收入总和。

从社会角度讲，腐败会破坏社会公平和公正。北宋末年贪官王黼公开出售他所掌握的官职。老百姓为他的卖官行径编了顺口溜：“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这种权钱交易加重了冗官现象，使得徽宗朝成为北宋历史上官员数量最为冗滥的时期，也加剧了社会不公平与不公正，使得没有才学的人上位，有才学的人没有平台发挥作用。

传达反贪腐理念

百姓对贪腐的痛恨在民间达成共识，这种共识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在影响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官员这支队伍方面，反贪文化打下深深的烙印。封建社会中，郡县治，天下安，地方政府官员执政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其执政理念所影响。如果一个地方官头脑中

持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思想，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一己私利而实施腐败行为，会加重百姓负担、引起社会情绪不满、严重销蚀统治基础。如果一个地方官员头脑中持有反贪意识、清官理念，并且将权力最大限度地用于给老百姓办实事上，会赢得百姓称赞、减少社会不满情绪、巩固统治者权力基础。

百姓在谣谚中所表达的反贪意愿渗透到官员队伍中，对于官员提升反贪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封建社会，悬于地方政府公堂之上的匾额，如“明镜高悬”“公正廉明”等就是群众盼望“清官”的表达。除了匾额之外，还有古代县衙厅壁门楣，许多官员自己就表达了对腐败的痛恨及对清廉的向往。明代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王恕在官衙门口贴出一副对联：“任于朝者，以馈送及门者为耻；任于外者，以苟且入都者为羞。”清代有一个地方官叫陈景登，在衙门口贴出一副对联：“头上有青天，作事须循天理；眼前皆瘠地，存心不刮地皮。”

当然，如果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头脑中有反贪思想，而且还将其付诸实践，这样就会减少、消除贪腐行为，进而造福一方，王恕、

陈景登属于这一类。如果言行不符，头脑中有反贪理念，但实际上没有付诸实践，反而大肆收受贿赂，则成为官场“双面人”。

唐代仆射刘崇龟表面上以廉洁自居，而且还以粗茶淡饭招待同僚以博清廉之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并没有做到清廉。在他死后，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记载：“家人鬻海珍珠于市。”这种奢侈品的出现恰恰证明了他的不清廉，或者说，他没有做到他所宣称的那种清廉，但是当百姓“讥之”。晚清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把慈禧御赐的“清正廉洁”金匾送回家乡挂于李氏祠堂，作为光宗耀祖的宣扬。没想到几天后，百姓在李氏祠堂大门上写了一副对联：“市屋千幢皆姓李，良田万顷属中堂。”这是民间对李鸿章“双面人”的揭露。十月革命后，在清理冬宫档案时，发现了档案库秘存的李鸿章在中俄密约签订背后收受道胜银行三百万卢布贿赂。在李鸿章办洋务、为官过程中，收受巨额贿赂。据容闳说，“李鸿章绝命时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从一个侧面可见他的贪腐。所以，一句“宰相合肥天下瘦”广为人知。

（文/石志刚 来源：《学习时报》）

明清时期的漕运总督：权力很大，清浊各分

漕运的历史甚为悠久，秦汉时就已经开始实行。何谓“漕”？胡三省注《史记》“漕挽”云：“水运曰漕，陆运曰挽。”元明清之际，由沿海省份征收米石，沿水路运河直达北京通州，故称“漕粮”。因其重要，故自明代起，设漕运总督官职，专司职掌漕运。清朝入主中原，亦靠漕运，沿明制设漕运总督，并专设“总漕部院衙门”机构。该官品秩为正二品，如兼兵部侍郎（类今国防部副部长）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类今监察部副部长）衔，则为从一品。乾隆十年后，都察院不设专员，御史规定由巡抚、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兼衔。

漕运总督尊称“漕帅”

漕运总督权威重，有负责保障漕运的亲辖军队，仿地方总督、巡抚之亲辖部队“督标”“抚标”，而称之为“漕标”。《光绪会典》载：漕运总督所亲辖“漕标”共分本标左、中、右三营及城守、水师等共七营，兵额3400余人。辖制武职官佐，最高者为从二品的副将，并节制鲁、豫、苏、徽、赣、浙、鄂、湘八省漕粮卫、所（因上述八省漕粮归漕运总督管辖，其余省份粮务归地方总督、巡抚）。

漕运总督设衙门，非今人所想象称“总督衙门”，而称“总漕部院衙门”，衙址设于江苏淮安，不受当地巡抚、总督管辖，不受部院节制，直接向皇帝负责，可专折和密折奏事。总督按清代官场规矩，尊称“漕台”，因其领兵，故又尊称为“漕帅”。又因兼兵部侍郎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故出行仪仗、官衙灯笼署“总漕部院”。沿海收粮起运、漕船北进、视察调度、弹压运送等，均需总督率官佐“漕标”亲辖。

每年漕船北上过津后，循例要入京觐见，向皇帝汇报漕粮运输完成诸事。清代皇帝非常重视漕务，如康熙皇帝，亲政时将“漕运”“三藩”“河务”并列为必须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今人说到道光皇帝，多与鸦片战争相联系，其实道光不仅节俭自律，对政务更是亲力亲为，“盱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除了惩贪、吏治、清厘盐政等，他在“漕运”整顿上也花费了很大精力。他登基后首先急迫要抓的三件大事：调整中枢、治理河漕、平叛新疆，漕运亦列其二，可见重视。所以对漕运的官员甄选、查核，包括具体事务，并不松懈。他的政绩不仅在治河通漕，还开通海运漕粮，在清代不失为创举。

明清巡漕御史监督漕运

咸丰年间因战事频仍，咸丰皇帝特令漕运总督节制江北镇、道。咸丰十年裁撤江南河道总督，其河工调遣、督护及守汛、防险事务，均由漕运总督所属漕标部队兼管，这是漕运总督权威最重之际。漕运总督出过不少名宦，清浊各分。直到光绪三十年河运全停，“总漕部院衙门”和漕运总督才被裁撤。这个机构对运河漕运生命线的畅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漕运总督节制八省漕粮，于每省设负责漕运的督粮道（又称“粮储道”），正四品。督粮道职责是监稽收粮，督押粮船直驰山东临清，待山东粮道盘验结束回任。山东粮道须待最后一批粮船抵通州才告回任。最后一批粮船按规定由漕运总督亲押至通州，并向皇帝述职后才可回任淮安衙门。

为监督漕运，明代还专设巡漕御史，负监察之责，权力极大，不受漕运总督节制，直接向皇帝负



责，有权弹劾总督。清代亦仿明制，设巡漕御史四人，分赴稽查，襄办漕务。品秩不高，但职权令人忌惮，可风闻专折密奏。

相比较费力不讨好的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在明、清两代可属肥差。我曾读野史，载某人受邀赴某漕运总督家宴，山珍海味，不一而足，其中有道菜不过是一盘猪肉，甚为鲜美。某人离席去解手，发现后院有数十头死猪，经问才知，每头猪只割一片肉，乃做成此肴，由此可见漕运总督家宴的气派与奢靡。该总督家肴，据说猪肉饌肴花样达50余种（《金瓶风月话》）！又因漕运总督与绅粮大户、漕帮（青帮）密切，故内幕甚多。当然，贪腐者还是少数，大多漕运总督还是肯忠于职守。漕运是中枢首善之区的生命线，玩忽职守处分是极重的。

贪官凶横引发陆名扬案

漕运总督在清代为一、二品大员。帽饰红宝石（二品为珊瑚），蟒袍为九蟒五爪（二品同），仙鹤

补服（二品为锦鸡）；收入并不高，岁俸银180两（二品155两），年养廉银15000两至30000两左右（二品20000两以下）。

清代漕运积弊甚深，朝廷一直想整顿，道光年间曾派权倾朝野的穆彰阿两任漕运总督，以整顿滞运等弊。道光年间名臣陶澍也曾大力整顿漕务，并奏准苏州等地漕米改由海运，以杜绝弊端。虽然海运一旦实行可节约时间人力资金，但并未完全代替河漕。

另外，漕粮装运、征收、行船次序、期限管理及至运送时间、航行里数都有繁杂的制度，各省有船帮、胥吏勾结，正粮之外“耗米”“耗费”横征暴敛，苦的是承担漕粮、漕运的船工和老百姓！清代道光元年就曾发生过一起所谓“把持漕务”的大冤案。清代学者包世臣曾写《书三案始末》，概括来说，是浙江归安人陆名扬看到漕粮弊端，而纠劾借漕粮征收敛财的地方官员。清代漕粮征收可以用银两替代，但因贮运过程有损耗，为弥补则制订多种附加费，其额度皆由官

府决定，故州、府、县官吏趁机暴敛。陆名扬抓住归安知县徐起渭为浮收而伪造“八折收漕”朱牌，逼迫其“定约”：“每斛一石，作漕九斗五升，绝‘捉猪’、‘飞觥’诸弊。”

各地闻之纷起效仿，百姓负担大为减轻，但“府县恨名扬甚”，因为断了敛财的来源。故官吏们捏造陆名扬“纠约抗粮”“把持漕务”，这在清代是很重的罪名。差役逮捕陆名扬时，遭到百姓们的抵抗，差役落水而死。官府借机深文周纳“逞凶拒捕”“殴杀官差”，将陆名扬问成死罪，其被“即行正法，枭取首级”。亲手下令处死陆的是浙江巡抚承瀛，“后乃知由于官吏之酿变，深悔之”。

帅是有名的清官，《清史稿》称其“治浙数年，以廉勤著”，曾平反过著名的徐文诰冤案（《书三案始末》）。由此可见清代漕运陋规的黑暗，官吏凶横敛财，不惜“酿变”草菅人命。陆名扬案的情节极复杂，牵扯面极广，我只不过撮其要而述之，若铺陈开来，是写影视剧的好题材。

据史料载，漕运最昌盛时期，仅从天津至通州北运河上，一年要通过漕船两万艘，护漕官弁达12万人次，还有商船一万艘。波光云影，舟舳相连，帆樯毕集，是何等蔚为壮观的画面！

（文/朱小平 来源：《北京日报》）

白沙埠镇“三大课堂”关爱女性健康

今年以来，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卫计办通过办好青春期卫生保健、婚育期优生优育指导、中老年养生保健等“三大课堂”，关爱女性健康，提升服务水平，受到了广泛好评。

（王伟勋）